

时政点击

广东省委书记为何关注马云

即便在“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还不忘特地约马云来北京,并于广东团驻地会面。“我见了马云,并邀请他到广东发展电子商务。”这是汪洋书记亲自披露的会面内容。其实就在上个月,汪洋书记率领的广东考察班子“取经”长三角时,曾经探访过阿里巴巴位于杭州的总部。

“广东为何没有阿里巴巴?”类似的话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有过,他的“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的发问,当时很是引起了上海人的讨论。那么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广东、上海为何对马云、对他的阿里巴巴如此情有独钟?背后原因不得不让人深思。

事实上,在省委书记的眼中,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正是广东当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方向所在。

阿里巴巴从一个小企业成长为如今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业,其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创新型中小企业如何做大的真实写照。阿里巴巴刚成立时,是一个新生事物,这就涉及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是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企业而对其不闻不问,还是为其成长提供一个宽松、宽阔、充裕的环境和空间。

一般来说,创新型中小企业都是高风险、高回报,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降低风险。为此,政府在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渠道上必须大力支持,国企贷款政府可以担保,中小企业的贷款也要为其拓宽渠道;创新需要技术人才,政府就要为企业雇用、留住优秀人才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眼下,广东中小企业的发展或多或少地面临着一些困境,阿里巴巴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恰恰与这些中小企业的发展思路非常契合。在它们中间,如何培育出下一个马云、下一个阿里巴巴,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的支持。

比尔·盖茨宣布退休被问及“你认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是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的马云。”在盖茨眼中,阿里巴巴或许代表着互联网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在省委书记的眼中,阿里巴巴则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一个产业转型的典范。

李 龙

一个公民对政府行政成本公开的设想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日前向全国政协提出建议,各级政府应把履行职能所发生的费用,也就是政府行政成本披露于众,以便人民群众对其进行有效监督。(3月11日《楚天都市报》)

政府的意义:政府行政成本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可以说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意义深远。作为一个同样对政府行政成本公开怀有热切盼望的普通公民,也对此工作从各方面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设想,希望对政府有关部门有所启示。

公开的意义:政府行政成本公开,首先可以让政府做到财务透明,有效防止政府机关在日常运作中的铺张浪费和少数人从中浑水摸鱼,捞取不义之财。其次,行政成本公开,方便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把纳税人的钱用在纳税人看得见的地方,而不是自己的

钱被花了,却不知道花在哪里,干了什么。这有利于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增加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公开的内容: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除了一些特殊部门以外,在财务上对纳税人本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政府行政成本公开的范围应包括政府公务人员发生的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尤其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公车使用、手机话费、办公用品、公务接待费以及出国考察培训等支出情况。

公开的渠道:在农村,各村庄都设有“财务公开墙”,把村委会的收支情况在墙上一一向村民公开。各级政府机关除了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以外,还有更多可以选择的渠道,比如可以定期在政府自己的网站上公开,方便群众点击浏览;比如可以定期在当地的报纸、电视等媒体公开,方便群众随时看到、监督。

总之,只要可以方便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了解,任何渠道都可以利用。

公开后的反馈处理:正常情况下,群众对于政府公开的行政成本,必然会有疑问和不明白、不理解的地方,那么,对于群众这方面的反馈信息,政府应该给予及时的解释和答复。对于群众反映强烈,严重质疑的地方,政府就应该回头看看自己在某个地方钱是否花多了,有些钱是否花错了,以后是否应该有所改正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行政成本公开后,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对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政府要进行积极的整改,做到让人民群众满意。也只有这样,政府行政成本公开才有可持续性,才有意义,否则,你只是公开,对于群众的反馈和意见却置之不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公开不公开,也就没有区别了。

苑广阔

“买生二胎指标”只能让富人超生合法化

在今年的“两会”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李成贵提交了《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提案,建议以有偿方式来实现城乡人口生育调节,提出“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随即在代表委员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议。(3月11日《东方早报》报道)

李成贵提出的城市居民付费“买生二胎指标”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目前,我国在城市实行严格的“一孩”政策,但在农村,大部分省市都实行“一孩半”或“二孩”政策,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均高于农村,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国民平均素质的提高。但是,这种付费“买生二胎指标”的做法,并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其结果很可能只有一个:让富人超生合法化。

既然是“买生二胎指标”,那么其价格一定不菲。因为价格低了,肯定会有不少人都来买,那么计划生育政策也就落空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既能够有效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又能够让“买生二胎指标”能够实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买生二胎指标”付费标准。可以设想,如果“买生二胎指标”真的实施,那么“买生二胎指标”的费用绝不是小数目。而“买生二胎指标”费用过高,也只能带来这样一个结果:一般市民是买不起这个生二胎指标的,只有是富人才能够买得起这个生二胎指标。

而目前,富人超生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如歌星屠洪刚有三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安徽腐败官员刘俊卿一口气生下6个儿女……名人、富人因为有名、有钱等原因而随心所欲地生孩子,这早已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但是却少有人受到相应的制裁,最多只是交点社会抚养费而已。

如果“买生二胎指标”能够实行,最大的受益者基本上就是这些富人,因为他们不缺钱。这样,“买生二胎指标”只能让富人超生合法化,而一旦富人超生合法化,这必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对立等情绪,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危害无疑是巨大的。可以这样认为,“买生二胎指标”是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徐经胜

上学难不难贵不贵应该让百姓说一说

3月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曙光认为,老百姓所反映的“上学难、上学贵”是不对的,中国“不存在”上学难和贵的问题,只是“上好学难和贵一点”。

正如陈副省长所说,中国的受教育率已经近乎100%,在高校扩招后上大学也不再如鲤鱼跳龙门般难得得稀罕,从这个角度看,上学的确不难,但在教育资源公平性上老百姓的抱怨是实实在在的;在广大农村,教学条件简陋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城里,由于诸多限制,异地户口不能正常升学,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成为老大难,也是不争的事实。

再说上学贵,尽管国家近年来付出相当努力,减轻了农村和部分城市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但在相当多地方,教育乱收费现象严重,学生家庭负担沉重是客观存在的,而在扩招后越来越普及的高等教育则更“贵”。今天一个普通城市小康家庭往往要将家庭收入的30%、40%甚至更多,来支撑孩子的大学费用,至于农村学生的困难就更大。如果再考虑到如今毕业生普遍存在的就业困难,恐怕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家庭,都会认为负担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吧?他们喊几声“上学难”,又有哪里“不对”呢?

陈副省长在访谈中强调政府在教育上的努力和投入,这点谁都不会否认,但也应看到,早在1993年国家就制定了教育投入占GDP总值4%的目标,至今实现了没有?这一目标并非“高标准、严要求”——教育经费相对于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中国在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这项硬指标方面,连低于“欠发达国家”

的低标准、松要求都尚未达到,老百姓可以忍,可以等,难道不可以抱怨几声,期望几声么?

据《小康》杂志的统计,2005~2006年,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仅63.2%,民众对“中国教育现状”和“教育公平性”的满意度分别仅有58.6%和51.3%,均比前一年度有所下降,近七成被调查者对政府的教育投入“非常不满意”;而根据最新发布的2008年度中国教育蓝皮书《深入推进教育公平》,虽然公众对教育满意度“有所提升”,但“高满意度群体”比例也仅有区区57.4%,这一系列分数,有的勉强及格,有的甚至还在及格线以下,作为人民代表和政府主管官员,不应忽视这些数据,更不应漠视民众的呼声。

一言以蔽之,上学难与不难,贵与不贵,学生说了算,家长说了算,老百姓说了算,与其强作辩解,试图让老百姓闭嘴,不如踏踏实实增加投入,改善工作,把教育的事办好,让老百姓满意。

陶短房

ZHENGZHOU DAILY 媒体点击

编辑 杨学栋 电话 67655277 E-mail:cppy@163.com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应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

应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

里不会批准低一分录取, 社会舆论也不会答应。实际上是‘唯分主义’。”

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

“这几年全国高校的欠债有2000多亿。”

10日,顾海良说,连哈佛大学都有35%的学生是高收费招来的。顾海良说:“我曾问过哈佛大学的校长,你们难道不怕影响学校的声誉吗?那位校长说,我们哈佛的声誉是靠10%的学生支撑起来的。我又问,假如某市长的儿子或者

亲戚没有考取,想来你们学校上学,你收不收?这位校长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我当然收。”

顾海良说,实际上外国大学30%的经费是靠这个筹集的。现在只有中国是完全按照分数来招生。“大多数人认为分数是最公平的。招生

价生,多收别人的钱,哪怕用来资助贫困生,用于校园建设都是不行的。”

顾海良说,实际上很多孩子愿意交钱上学。国内每年很多孩子在国内差两三分,上不到想上的大学,被迫到海外去留学。到英国一所三四流的大学一年也需要25万,每年送给外国的有三四百亿元。“如果他们在国内有大学上,是绝对不会出去的。”

顾海良说,应该向国外大学学习,允许大学招收部分高价生以解决大学债务。在基本的条件下,学校绝对不会把很差的学生招进来的。并不要拘泥于一种教条式的规定。

据《长江商报》

四直辖市产交所统一规则 建立联合磋商机制

本报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及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等4家国内最具规模的产权交易机构,10日在沪共同签署“上海协议”,约定建设统一市场规则。这意味着,全国产权市场统一交易规则系统工程正式启动。

目前,我国共有产权交易机构200多家。由于市场缺乏完全统一交易制度体系,在跨区域企业并购重组时,时常发生各地政策随意性大、不规范运作现象,影响产权市场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因此,统一制度和规则,形成全国产权市场的信息交流、交易联动、项目合作、资源共享,已成为各地产权交易机构的共识。

根据10日签署的“上海协议”,沪、京、津、渝四家产权交易机构将建立联合磋商机制,对各自交易制度体系中的规则和流程的异同点,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磋商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四方统一的交易制度体系。同时,按照统一交易系统需求,4家机构还需根据具体情况对交易系统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总裁蔡敏勇认为,统一产权交易规则是资本市场运行成熟的重要标志,“上海协议”签署,是4家产权机构在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发选择,标志着全国产权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大大提速。

武汉26.6亿元打造全国最大城市湿地群

本报讯 记者10日获悉,作为武汉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的一个支撑项目,大东湖生态水网工程总投资将达26.6亿元,届时有望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湿地群、全国最大的城市生态旅游风景区。

武汉是国家首批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城市,而大东湖项目则是整个水生态城市试点中的一项支撑项目。大东湖生态水网构建工程项目,主要涉及水利工程建设、市政与生态环境建设、交通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三大方面,总投资达26.6亿元。

中原铁道国际旅行社 云贵爸妈专列 3月16日-25日 郑州始发 A线:贵阳、黄果树、昆明、大理、丽江 1880 B线:贵阳、黄果树、昆明、版纳 1980

河南中原国际旅行社 泰国包机 七日 普吉岛 +桃花岛+PP岛 七日休闲游 498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长沙、韶山 4月7日-14日 超值 2580元/人